

## 【历史文化研究】

## 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

## ——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

贺立华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关键词] 郑观应; 传统书生人格; 现代转型; 兵战不如商战

[摘要] 100多年前的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他的“兵战不如商战”思想,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的出色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一系列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对郑观应的深入研究,将为知识界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中图分类号] C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02)06-0110-02

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如果忽略了郑观应,将会缺少一个耀眼的光环。郑观应,这位百年前启蒙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生命的光华,他的《盛世危言》,他的发聋振聩的言语,他出色的商战行动所表现出的实践精神,打破了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有宝贵的价值。

古老的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就是要以西方工业文明发达国家为参照,变落后的中国农业社会为先进的工业社会,变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型,离不开人的转型,离不开人的观念思想的变化。郑观应正是一个由封建文人向现代文明完成转型的光辉范例。

1 郑观应是第一个颠倒了中国有史以来“士农工商”的职位序列的知识分子,他放胆抬高了“商”的地位,而且身体力行弃文下海经商。

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士”的地位是最高的,“商”的地位是最低贱的。但,历史给中国开了个大玩笑,正是被中国传统所不齿的外国商人敲开了东方帝国固若金汤的封建城堡;历史也给饱读诗书的郑观应提供了一个机会,使科举落第的书生郑观应变成了新型商人郑观应。作为新人郑观应,同样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但他高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地方是,他认为治国平天下,并非只有作官一途,保卫国家,抵御外侮,领兵打仗固然重要,但国家的强盛最终靠的还是实力。他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国家真正富有了,国力才能强盛,经济上强大了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样,就有可能“不战而息战”,不战而胜。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有钱使军队具有先进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工商业可以不动刀枪地

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不动声色地攻城掠地。他以“兵”“商”相比,而把发展工商业看得如此重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sup>[1](P385)]</sup>郑观应以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以忧国的痛心和爱国的热望,提醒国人,要立足于世界,必须靠有力的商战。郑观应颠倒了中国职业序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商”的地位抬高到富国强兵的高度,真可谓石破天惊了。

2 郑观应的可贵在于他并非是一般的论说“商战”的重要,而是身体力行,弃文下海,从工经商。他力倡西学引进技术造机器办工厂,他创办交通、电讯、航运、铁路事业,发展煤炭、金属采掘冶炼工业;为使工商业顺利发展,他倡办“银行”。他认为企业官办不如民办,他熟练运作股份制企业,一开始他就解决了所有制革命的问题。

他几乎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体会了一遍,每一个步骤都有周密的考虑,每一个行业都有科学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战体系。

中国读书人历来有“坐而论道”务虚不务实的习气。郑观应却是另类读书人,他不仅具有“论道”的见识和笔力,更具有注重行动实践的务实精神和卓越的才能,他不仅能说出一种新文化,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去做出一种新文化。这种做出一种新文化之所以更为重要,就在于唯有如此方能成就一番彪炳千秋的事业。行动,务实,这恰恰是中国读书人最缺乏的精神,更可笑更可怕的是中国的读书人对自己只会务虚不会务实的劣根不以为耻,反以为

[收稿日期] 2002-08-01

[作者简介] 贺立华(1948-),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

荣！至今依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郑观应的实践所体现出来的行动改革学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大于他《盛世危言》论道的启蒙。

3 破皇权，倡科学民主自由；看破了中国商战无能的本质的本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

集中代表郑观应的独立精神和改革思想的论述是《盛世危言·自序》中的话：“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sup>[1] (P233-234)</sup>实际上，郑观应是在为封建的中国勾勒一幅政治昌明人尽其才、经济发达地尽其力、市场自由物畅其流的美好的蓝图。

郑观应的深刻，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商战的重要和制定出商战的策略，还在于他看到了影响商战的症结是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他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愤然指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他认为，要发展科技，发展工商业，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新的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要建立西方式的议院制度，开设议院，实行立宪。这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之前放胆攻击皇权，要求中国实行议院制的第一个中国人。郑观应并不是空论议政，还提出了一整套内政改革的保证措施，如吏治、教育、用人、刑法，办报、盐务、漕务、治河、旱潦、救灾、济贫等等方面，他都有周密详尽的论述。

对于官吏、议员的选拔，他主张民主“公举”，反对清政府的任命“保举”，也反对清政府的“易地服官”制度。他认为“保举”的弊端容易造成贿赂徇私；“易地服官”并不能杜绝徇私，反倒因为“人地生疏，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形成了“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漠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sup>[1] (P382)</sup>郑观应认为，“法之善者莫如公举”，因为只有民主选举出来的人，才能人心信服，才能“安百姓”、“利地方”。

对于议院制度，他认为必须搞好吏治内政，官员要年轻化，工作要高效率，要作到“年老让贤”和裁减“冗员”。如对于冗员，他说：“国家设官分职，原所以治民保国，使各有所职，而百事具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廩禄之人，即多一脓血膏之人，甚且多一债国是之人。”<sup>[1] (P457)</sup>

对于言论，他认为应确保君民沟通，使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渠道，这样才能搞好君主立宪下的议院制。郑观应认为，广办日报是民隐得以上达的好办法。有了日报，“凡献替之谏，兴革之事，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sup>[1] (P345)</sup>这是很好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治国安民。

4 学贯中西的学识，富国强兵的忧患意识，切合国情民意的务实策略，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的斡旋能力，构成了郑观应新型中国知识分子练达人格的多侧面。

郑观应是主张推行西学的，但他反对西化，他非常看重自己民族的文化，他说：“虽然，从事西文西学固为知几之士，识时之杰。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若蹈浮薄少年之习，略识洋文，略谙西语，便谓豁然谔谔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

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则非余之所敢知也。”<sup>[1] (P285)</sup>

是否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就没有慷慨悲歌《盛世危言》的郑观应，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了他济天下、救苍生、忧国忧民的情怀，正是由于这种情怀，才使他走上了发展工商业、富国强兵的儒商道路。

他从西洋文明中提升了救中国的眼光，他也从民族文化中汲取了济世的智慧。例如，郑观应在阐述自己的改革思想时仍沿用中国传统的“托古改制”之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有利于变革的思想内核。他这样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sup>[1] (P300)</sup>例如，郑观应在力倡办报议政的时候，他仍然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言说当今办报议政之必须，“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取、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灼，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沈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尽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sup>[1] (P345)</sup>

这些论述，显示了郑观应的博古通今的学识，也显示了改革运作的智慧。

西学的文明提升了郑官应的思想境界，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浸润了郑观应的人格精神。孔孟之道的“仁爱”“和为贵”，使他广结善缘，使他有很强的亲和力，使他常常化干戈为玉帛，开创柳暗花明的局面；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使他习于商战，使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说，诸子百家之说都能为他所用，用起来得心应手。

郑观应通晓西洋政治经济，而又谙熟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国情。经过反复比较研究，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改革方略。在今天一些学者看来，“君主立宪”制似不如“共和制”更为先进，“改良”不如“革命”更为先进。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却是更符合中国国情民意，更利于连通政府和广大百姓，更易于操作行施，更易于不动声色地消解封建专制与独裁，会付出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郑观应既作洋办，又作中办，既搞经济，又搞政治，既忧民，又助君，既连结商民百姓，又连通官府要员，既有文功，又习商战，既务虚，又务实，他将学者的智力、政府的权力、企业的财力，多力合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瓦解中国的封建专制，推进中国的改革，推动资本的滚动发展，致富致强，抵御外侮，拯救中国。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学识综合才能、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出色的社会斡旋才能。

细检中国历史，知识分子名流如云，但似郑观应这般中与西、知与行、启蒙与行动，如此和谐结合，人情世故如此练达，学问实业如此卓越者，实乃罕见。难怪郑观应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孙中山，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毛泽东。对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当为知识界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夏东元. 郑观应文集, 上册〔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 岱 人〕